



大潮

白云山人 著

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
广州出版社



大潮

白云山人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潮/白云山人著.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 - 7 - 5462 - 2010 - 9

I. ①大… II. ①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11117 号

- 书 名 大潮
Da Chao
- 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天润路 87 号 9、10 楼 邮政编码: 510635
网址: [www. gzcbs. com. cn](http://www.gzcbs.com.cn))
- 责任编辑 李碧梅
- 封面设计 梁健坤 李成浩
- 责任校对 丁新民
- 印 刷 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横江 邮政编码: 511400)
-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 印 张 22.75
- 字 数 360 千
-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
- 书 号 ISBN 978 - 7 - 5462 - 2010 - 9
- 定 价 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大潮》是2003年6月出版的《硝烟》一书的续集。两集共花去作者4年的时间。《大潮》是反映我国改革开放这个伟大历史进程的一个侧面。作者有幸从中年到老年感受到中国巨变的画面。从文化大革命经济濒临崩溃发展到现在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其他事业也取得相应的发展，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和尊敬。今天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感到欣慰，我们没有辜负时代的重托，对子孙亦有所交代。

《大潮》是许多故事的叙述，如作者经历过广州地铁筹建、上海地铁建设和长期技术咨询等工作，涉及到许多公众人物的活动。作者认为首先要反映真实性，而非文艺性创作，能引述文件、记录、报道的尽量引用，尽量尊重客观性。如果对这些故事进行文艺创作，按作者的写作水平恐怕很难达到目的，希望读者原谅和理解。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给我们国家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是有划时代意义的，深得民心。要在实践中落实，无异于一场革命，还得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我们有了前一段发展的基础，又有符合今后发展的政策，中国一定能发展得更好，关键仍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断。

大文豪高尔基曾说：“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容易被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作者认为不管对时间如何褒贬，充分利用时间总是对的。下一代的旅行人，祝你们一帆风顺！

目录

第一章	新起点	1
第二章	涌动	21
第三章	隧道启动	47
第四章	震动	61
第五章	地铁启动	91
第六章	访法历程	116
第七章	访苏随记	152
第八章	外经纪事	177
第九章	地铁实施	216
第十章	“留学”上海	259
第十一章	咨询之路	299

第一章 新起点

余锐领着全家大小四口人，终于回到阔别 28 年的故乡，心情是激动的，也是安定的。这是他近十年来梦想的实现，从此将会过上没有硝烟，不再动荡和分居的生活，这对一般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生活方式，但对余锐呢，真是太幸运、太奢华的生活境况了。没有对比是无法体会到的，在部队里有的老首长、老同志，他们子女的年龄正好是在就业或结婚的年龄段，就只能随着部队的足迹，散落在天南地北不同的角落了。余锐算是幸运儿，子女年龄都小，就能回到他们的原点上来，再从这里出发去创造他们的人生。但余锐仍有一个遗憾，就是黄珊的外婆，这年已经 84 岁，不愿离开故地随他们回广州来。虽然余锐能理解高龄老人那种故土难离的情怀，但毕竟是他一件毕生愧疚的憾事。

部队第二批干部转业的大军，奔向地方工作会带来的问题，早在部队时，余锐和战友鲁正潮的惜别长谈中，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那么多的干部涌入地方，会给地方工作带来很大压力，一定不要因自己岗位的安排增加组织上太大的困难，生活上也不要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何况对铁道兵们来说，相信没有什么真正称得上是困难的问题。就这样余锐被分配在广州市环市路 204 号广州市坑道管理所设计科资料室工作，住宅就分配在海

珠区工业大道纸厂边上一幢未竣工的宿舍五楼，一个一厅一室单元住了下来，暂时水电都不通，一家人就靠两盏很明亮的煤油灯和水缸挑水解决竣工前的水电供应问题。

余锐是非常满意组织上安排的，初下地方一切都不熟悉，在资料室工作，可以阅读许多资料，了解地方情况，扩大知识面，这是余锐所希望的。住房也很好，不仅能遮风避雨，而且还是楼上楼下的现代气派，国家拿出这样的条件照顾他们已属不易了。妻子黄珊分配在市红十字会医院药房，女儿转学在四十五中读初一，儿子随母亲在医院的托儿所，一家人都安顿下来了。每天大家围在一起吃晚饭，晚上除了黄珊要对付一大盆要洗的衣服外，一家人又在一起看书学习、做功课。这种团聚的家庭生活，使人觉得可贵和幸福，小孩子刚开始还好奇，不时用眼睛瞄一下余锐，这是他们的爸爸啊！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好好过日子吧！

余锐这时也是沉浸在幸福生活之中，心情是放松和愉快的，他可以尽到对家庭的责任。为了节省上班堵车的在途时间，他天蒙蒙亮就出门赶到单位吃早餐，还能争取到四十分钟时间读英语。坑管所执行的是工人的作息时间表，下午四时半就下班了，他赶快乘车在六二三路转车时买好菜，争取早点到家煮饭，这样在家里人一到齐后就能开饭，饭后赶紧去楼下挑水，再搞一下家里和自己的卫生，整个过程是很紧凑的。接着就一家人围在桌前，点亮煤油灯各人做各人的事了。孩子们的学习，余锐是无暇顾及的，所以最初大家虽然围坐一起，和孩子们缺乏交流，互相还有陌生的感觉。年轻时余锐读贺知章写的七言绝句《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当时只是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现在想起来真是多少滋味在心头了。

星期天是休息日，那时还没有双休日，这一天要买米和副食品、日用品，将蜂窝煤挑回来，还要大范围搞一下卫生。在市人事局工作的兰姐又教余锐，把肉票限量的肉买回来，煮成红烧肉，多放点盐，煮菜时，挖一勺放在菜里，既解决油荤，又节省时间，所以这些半成品也只能放在星期天去加工。但是只要有可能，他们一家人也会去附近的公园走一走，增加孩子们的见识。他们感受到城市的气息，也很高兴。其实这时孩子们的学

习是有困难的，首先一个是语言不通，许多老师是用广州话授课的，再加上在办理转业期间又耽误了不少的课程，余锐又只顾忙工作的事，结果影响了女儿的成绩，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余锐在部队生活 28 年，对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技能都很生疏，要当好老百姓，还得像当年参军时要从军人的举止、着装、作息训练一样，从基本学起。广州的夏天很热，为了保存蔬菜，他想办法把蔬菜泡在水里，以为可以降温，结果菜都泡臭了。穿了那么多年的军装，从来不会想到衣服有什么厚薄之说，反正是后勤发给就穿，到地方以后又没添什么便服，因为旧军装和在越南期间发的青年装就足够穿的了，大热天也一样穿。一次下班时大家在等公共汽车，同事易工程师关心地对余锐说：“这么热的天，你怎么还穿那么厚的裤子啊！”这时余锐才知道裤子也有厚薄之分。一天中在公共汽车上的时间很长，人少的时候，余锐就利用时间看书，人多了他得站起来，就听那些下班的女士们闲谈。她们谈话的内容大都是谈食物的加工方法，对余锐帮助很大，像是上烹调训练班课程。但有些做法也使余锐质疑，一位中年妇女在教人煲汤时，讲得非常细致：“煲鱼头汤要放八粒红枣，红枣的核要去掉，这枣核会引起燥火的。”余锐疑心这么细微的处理，到底有什么根据？可能谁也没有认真去研究过红枣核燥火的原因，只是根据口耳相传下来的做法去说吧！在公共汽车上人很挤，还得提防扒手。那时社会上流传，东西南北中，发财去广东，广州扒手是集“全国精英”之大全，他们的绝招余锐是领教过的。一次刚发了工资，余锐把它放在左上衣的口袋里扣好，公共汽车乘客很挤，余锐挤上车后，反身抓住扶手，思想上警惕性很高，一直看着有没有人打这个口袋的主意，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待到下车时，乘客有上有下，非常拥挤，余锐奋力下了车，正在庆幸安全带回工资时，刚走两步发现上衣口袋已被掏空，一个月的工资不翼而飞了。扒手趁着余锐下车时注意力转移，如果说一秒钟有三十二个刹那，估计仅用了十个刹那，扒手就把钮扣打开，掏出全部工资，一气呵成地完成规范的动作，其动作之迅速、干净利落，不得不令人折服。余锐上班习惯上带一个挂包，基本上都是给扒手划破的。真有点叫人防不胜防。

人坐公共汽车久了，也会坐出经验来的，当时广州市的公共汽车大部

分是十四米长、中间带连接铰的通道车，因为人多，乘车本身是个体力活。刚开始余锐上了车就顾虑下车难，所以在车门附近就不愿往里走，但这些地方是最挤的。一次余锐上车以后反身用力，双手抓住顶部扶手，挡住身后靠着坐位站立的小学生，正在动弹不得，这时新挤上来的一位女士被后面人群推动站不稳，整个人扑在余锐身上，给余锐增加很大的压力，场面是非常尴尬的。这种情况的出现怨不了谁，谁也控制不了这种局面，这是很正常的，大家都理解，没有发生争执。这件事教育了余锐，经过多个位置的试验，他发现铰的位置是相对宽松的，只要注意安全，不要跌入铰以外的空隙里，这里应是乘车的最佳位置了。

市坑道管理所主要任务是维护广州市六七十年代修建的人防地下工程，由各个工种一百多人的工人组成。但机构却比较大，有一个由各专业技术人员三十多人组成的设计科，这是几次地铁工程准备阶段上下马造成技术干部聚散的结果，目前的任务不饱和，主要是承担人防的设计任务，此外做一些地铁技术的准备和积累，尤其在地质勘探方面一直都没有停顿。这里曾经是藏龙卧虎之地，因为搞地铁工程而调进的技术人员，大多是技术精英，只是多次上下马又变得参差不齐了，但仍不失为人才的储备。

市坑管所的所址是当年九号工程的一个进出口部的工地，堆积着施工的弃土，还有一口承接排坑道水的鱼塘，据说地下水温在冬天相对较高，流花公园养的非洲鲫鱼都须要放在这里越冬。此外还堆积着一些原木钢筋等材料，工地的一些平房就是机关办公的地点了。设计科就在一个大仓库里，像一个大课堂，余锐被安排了一个办公的位置，这个条件比铁道兵的野外条件好多了。因为这是一个城市中的工地环境，对余锐这位常年生活在工地的人，还真有点亲切感。

余锐来到新的岗位，觉得不熟悉的知识太多了，工作时间全都用在看资料，除了工作上的事，他极少参与大家的闲谈，一天到晚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他看到1978年5月份广州市委对贯彻中共中央十三号文件精神的批示写着：“积极着手筹建地铁、过江隧道，改造九号工程。”以及1978年11月7日省委常委会议决定第五项：“广州地区（包括省、市领导机关）的整体人防工程规划……根据平战结合、打防结合的方针，结合建设地下

铁道和其他地下建筑，要求在今年内研究制定出方案，报省委批准。”看完内容，他很觉兴奋，说明省委、市委对这些难度巨大的工程，已经开始有所要求了。

这时设计科正在组织对香港地铁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英文原版进行翻译，并准备出版。他们先请翻译公司将全文译成中文，再分专业，请专职翻译和能翻译的技术人员把关，最后领导分配余锐作统稿工作。余锐这时自学英语才两年，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姿态，本着学习的意愿，大胆地承担下来了。

这份报告原名是《Hong Kong Mass Transit Further Studies》，由英国咨询公司 Freeman Fox 牵头，和其他专业公司一起，在 1970 年 8 月完成的。这份报告使余锐学习到许多地铁的知识，接触一些地铁新的理念。那段时间，他晚上都用来做这个工作了，虽然是在煤油灯下，他一点也不觉得疲倦，愈做愈有兴趣，他从这里了解到外域地铁建设理念的发展，和国内有很大的差别。

首先，报告非常重视对交通客流的分析计算工作，地铁是为交通服务这个理念他们是很明确的。在报告中它用了五分之一的篇幅，运用交通工程学中客流预测的技术，对系统的客流进行预测，并以此作为评价路网、选定线路的依据。而我国最早有地铁运营的北京、天津两市，地铁建设指导思想，都是从人防工程蜕变出来的，即便是正在筹建地铁的城市，也是围绕着人防建设来进行的。交通工程学的理论尚未传入中国，四阶段法客流预测技术的名词翻译，字典上都没有，也只好由他们来命名了。这个修建地铁目的性的差别，使我国地铁发展离开了服务的主体，线路没有了评价的标准。修建地铁是为了刺激地价的提高，政府土地财政收益，实际上是寅吃卯粮，提前吃了子孙饭，地产商成了最大的赢家，而城市的经营成本却大大提升，地铁的这种粗放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这点已经为愈来愈多的人们认识了。反观香港地铁确立的以服务客流为目标，一直在调控着地铁的发展，他们以比内地地铁少得多的线路，担负起香港居民出行需求，成为全球交通能源消耗最低的现代化城市。这里面谁更明智些，不是很清楚的吗？

第二，香港地铁的成功，成为令世人羡慕的地铁系统。他们完全依靠经济规律作为掌控和指导地铁发展的总原则，政府确定采用审慎经营的原则，地铁成为城市经济的产物，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也约束了地铁发展的负面因素，控制了地铁的规模，报告中分析了线路运营的盈亏平衡点，是客流在每公里线路不少于1.3万人次。这点在我国编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是没有人去分析的。所以我们的线路规模是离开经济规律而充满了主观随意性的，有的市长还亲自画出城市地铁路网规划图。而香港的《报告》中，早期系统推荐的四条线路，其中的东九龙线因客流不足，四十年都未修建。可见确立这些互相关联的原则是多么重要，政府、地铁企业和乘客是互为支撑，又互相制约，而非政府独大的。香港地铁现在已成为赢利系统，是经济支柱，对社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第三，香港编写的《报告》研究的重点，是对客流和经济成果的分析，占去报告大量的篇幅，是从使用的角度去研究地铁系统可行性的。而我们国内编制的“报告”是技术系统和修建技术的可行性，占去很大部分的篇幅，而对源头和后果的研究是陪衬性的。这种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内容是低一个层次的问题，实际上反映了我国的工程建设不重视经济规律的现实。

余锐对比了国内外修建地铁的不同理念，觉得很重要，也很有意义，按照在部队时的工作习惯，写成一篇介绍的文章，还整理了报告中提出的各类数字，进行了“报告”的构成分析，供领导作为参考。科的领导看了以后，认为很好，批示印发给科内同志参考。最后余锐把这篇文章投到《隧道译丛》杂志，成为他回地方工作以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这对他的鼓舞很大，更坚定了他从工作中学习的信心，并感受到在工作中与外域比较的重要意义。

在香港《报告》译文脱稿以后，单位就联系了当时在粤华路的市委印刷厂负责排印。这天余锐正在校对稿件，印刷厂的一位工作人员跑过来问，“你们哪一位是余锐同志，有电话要找他。”余锐觉得很奇怪，因为那时的电话通讯是很稀罕的，何况电话还找到临时工作的单位里来，恐怕是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了，余锐不敢怠慢，赶紧随工作人员去接电话。电话那端传来了一位女同志的声音：“你是余锐吗？还听得出我是谁吗？”余锐一听整

个人都愣住了，还用问吗？这是最熟识不过的声音了，他脱口就回答：“褚百放。”听得出对方是非常激动的，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阵，她好像平静一些才说：“我已到广州来办事，你有时间的话，中午休息时到人民公园好吗？我们已经十多年未见面了，有好多话要说。”其实百放的情况，余锐从兰姐介绍中已经大体知道了。文革结束后，她从北京医学院毕业，现在夫妻俩分配在连南县人民医院工作，百放已经当了院长，并且是一个女儿的母亲。这年她已经38岁，时间一晃眼就过去十多年了。

这天中午余锐应约来到人民公园，这个公园范围不大，很容易就找到百放。她穿着一套蓝色的干部服，显得成熟和干练，还未等余锐开口，百放已经开始抽泣起来了。她坐在一个石墩上，两眼睁得大大地看余锐，脸色苍白，泪水哗哗地向下流。余锐很少和女同志接触，更没有看到过会这样流泪的女人，一时觉得手足无措。眼前这个结果是原来意料之外的事，现在自己又是当事人的一方，确实也找不到恰当的语言劝慰百放，因为这一切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所以他站在旁边无言地让她通过哭泣来减缓思想上的压抑。过了好一会，她慢慢地恢复平静，面色也开始红润了。余锐才友好地对她说：“百放，我们都十五年未见面了，时间过得真快呀，你生活得好吧！”百放很无奈地苦笑着说：“还好吧！余锐，我想向你提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恨我呢？”余锐还真未想过这个问题，因为1964年分手的时候就未恨过她，以后大家就没有接触，更谈不上恨了。因此他说：“百放，我为什么要恨你呢？要感激你还来不及哩，在那段日子里，你是那么关心和鼓励我的上进，使我能为人生打下一个较好的基础。至于在北京公主坟的那次谈话，你作了新的选择，我是很伤心的。但这是你的自由，我必须尊重你，不过那时我就相信你是错了，你一定会后悔的。虽然你没有选择我，但你原来固有的优点是一个不会少，你的缺点也还是存在，你过去为我所做的一切也是真实和客观的，它和我们之间的结果是没有关系的，那我为什么要恨你呢？我们不能成为伴侣，但还是好朋友嘛，人活着为什么爱不成就要恨那么狭隘呢？我现在不是一样很幸福吗？”百放听到余锐这么理智这么坦诚的回答，触动了她的情感神经，又一次哭了起来，她低着头不断地擦着泪水。余锐继续说道：“百放，过去的事情已经说开了，我们又都有

了自己的家庭，彼此都要对家庭承担责任。我们已经是步入中年了，整个国家正处于大转变的前期，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把过去这一段历史翻过去吧，不要让它再成为负担了。和过去相比，未来是更重要的。”

这次见面以后，百放一两个月总会在来广州公干的时候，找余锐出去见个面。那时候整个社会正在缓慢地但鲜明地变化着，很容易使人感受到，所以他们谈话的主题是很丰富的，何况过去他们两人一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呢！那时候变化最快的是女同志，几乎一夜之间都烫了个椰菜花头，年轻一点的就穿起喇叭裤，冬天大家都爱穿太空裤，街上显现一点不同的颜色了，青年男性又开始留长发了，这当然引起社会舆论的评头品足。不久街头巷尾陆续出现了许多烧鹅档口，像一个个书报亭似的。本钱小的用帆布或塑料布一支，就成了卖广东人爱吃的猪肠粉、白粥、油炸鬼的早餐摊档，人民北路就有“大老保”“大可以”档口，两个档口很近，非常热闹，老百姓也觉得很方便，这些都成了私人经济的起点。当时私人经济还是相当忌讳的，人们的意识中，认为担任公职、搞国营经济才是正路。因为在十年文革当中，大家批的是刘少奇“搞私有制和剥削有功论”，这点已成为社会意识的一个冲撞点。那时的政策是“摸着石头过河”，政府也没有明确的政策界线，但也不禁止人们从事这些经营活动，最能够说服人的理由是私人经济可以增加就业、搞活市场、方便群众，至于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好像老百姓想得不多。

余锐和百放见面，一般都是在余锐工作单位附近，比如越秀公园、流花湖公园、兰圃公园这些地点。大家交流思想的重点，主要是社会上出现的问题，余锐凭着对党的政策的理解，坚信邓小平同志的“黑猫白猫论”是正确的，所以他总是从正面向百放解释这些社会现象，而实践的结果也证明，这样做是能够解释社会上一些问题的。而百放呢，不知是一种什么心理，她总是对过去很留恋，不断地引导余锐对过去的回忆，有一次她挽着余锐的手，唱起了最感人的《山楂树》歌曲。她问余锐：“你总出来和我见面和交谈，觉不觉得对你的家庭和孩子有什么亏欠吗？”余锐很坦率地回答她：“怎么会呢？我们过去是恋人，但你说过，对我已经拿不出对待爱人的感情了。当然从那时起我对你也只是朋友的感情了，这个过程当中，

我没有过错，所以我能够坦然地面对你。事实上我们的重新接触也仅仅是朋友之间的往来，所以你不要想得太远了。”一次他们在兰圃公园遇到一位西方的旅游者向余锐问路，余锐回答以后，这位旅游者可能觉得当时很难碰到一位能说英语的当地人，就主动和余锐攀谈起来。余锐呢，也想在百放面前显露一下英语才华，用行动对她进行教育，就和这位旅游者认真地交谈起来。百放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很快就领悟到余锐传递的批评信息，因为她内心深处对余锐的遗憾是他未念过大学。现在她只能用一种复杂的心情、古怪的表情，在旁边听着，余锐看见了也颇觉得意。

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后，社会上加速发展和变化，思想界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学术风气显得更加活跃，禁区愈来愈少了。社会上对冤假错案的平反，包括对错划右派的平反，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平反，使群众的气开始理顺了，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较好的政治局面，经济恢复性的增长也很显著。这些余锐都是拥护和理解的，但形势的发展，也有一些问题是余锐想不通的。一是市场上物价的双轨制怎样才能并轨。一吨钢材、一吨水泥、一斤猪肉可以有公价，又可以有市场价，买公价的要有指标，市场价是敞开卖，两者的价差很大，无形中给指标赋予了价值，指标就是钱，要取得指标，得有权力，这些权力就是可以计量的钱，而权钱交易的结果，就是腐败的开始。余锐对这些现象又看不到治理的前景，而社会却在乱象中迅速分化。第二，社会的分配，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倒挂，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收入多。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应该让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呢？那时候公职人员一个月的薪金才几十元，高一点的一百多元，顶高的一层才三百多元，而且调薪一次基本是齐步走，还会牵出许多社会矛盾。但个体经营的劳动者，只要头脑灵活一点，勤奋一点，他的收入就比较容易超过公职人员，并且开始出现一批万元户。这种倒挂的情况，肯定不利于社会发展，但如何才能解决，也是看不到前景的。

在城市建设方面，非常缺乏资金，公共设施建设十多年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欠账甚多。到1980年，广州全市城镇人口增至218万，为原来人口的1.98倍，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到141平方公里，为原来面积的2.9

倍。全市工业总产值 90.5 亿元，财政收入 15.46 亿元。建委可支配的财力只有 6 亿元，基本上是吃饭财政。但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市委做出了恢复九号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为局级单位，撤销坑道管理所，成立地铁筹建处与九号工程合署办公，归市人防办领导的决定。任命河北人士、三八式老干部于树春同志为主任，并开展了地铁的前期准备工作。于主任身材高大，眉毛很浓且长，对人和气，很容易接近群众，大有燕赵之士遗风。人防办主任魏轩同志是红军时代的干部，又是大学生，曾任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副书记，是一位老干部、老资格，又是曾经和曾志同志搭档的老城建。这时他已是花白头发的老人，但身体很好，精力充沛。他为人正直，说话直率，对部属严格，在政府部门中很有影响力，像余锐这些个基层干部都敬畏他三分，而魏主任对他们这些人反而比较宽容。在两个层级的两位主任领导下，那时的地铁筹建处真是气正风清，是很适宜想干事业的人们工作的好地方。

为了落实省、市领导对筹建地铁的指示精神，地铁筹建处于主任想到的第一件事，是加强自身的建设，增加对地铁的感性认识。1982 年 11 月下旬，他亲自带队去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考察地铁。考察组一行七人，包括已经担任设计科副科长的余锐和几个主要的专业人员。在出发前于主任对大家谈了几点意见，他说：“这次出差是我们自找麻烦，一定要学一点、拿一点东西回来，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去做。这次学习的任务是要了解地铁最低限度的标准是什么？如何打通领导的思想？包括技术、管理、上层是如何打通的，要取得一些对上宣传、对下动员的材料，很具体的问题不要要求过高。考察时间不超过 12 月上旬，每个专业都要各负其责。每个人都要想一想这次要解决什么问题，也要互相帮助。经费问题，不要摆阔气，一般化就行，以节约为原则，合理的标准，大账小账都要算，名胜、展览方便时去，不要特别去。最后不要生大病，各方面都要有精神准备。”余锐听了觉得于主任的指示已经很全面了，尤其是打通领导思想的意见，他觉得很新鲜，过去在部队基层工作，都是令行禁止的，任务来自上级，叫干就干，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而地方的任务还要打通领导思想才能取得，这点给他印象很深。

这时的广东省已经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虽然主要还是思想酝酿时期，但在全中国也是占有先机的。外国元首、首脑访问中国一般先到北京，第二站就是广州了，这种情况当然也引起国内大众的关注，国内地铁同行对广州的动向也很有兴趣。而国内要去考察学习的城市较之过去，受改革开放之风的熏陶，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同行之间互相都很亲切，大家很愿意交流。不像1966年那时广州市林西副市长带队赴京考察组，受当时信息闭塞和保密制度的限制，只带回一张隧道限界图和一本苏联地铁的教科书。现在大家已开始感受到开放改革的春风扑面而来。

考察学习组第一站先到上海，这是我国最大的城市，是经济的中心，解放前就有东方巴黎之称，也是有着许多近代革命历史的名城。1956年余锐学习毕业归队途经上海时，还专程去当时最高的24层国际饭店的14楼餐厅，花两元钱吃了个西餐，算是开了洋荤，也出尽了洋相，把人家端来的洗漱水喝了，因为南方的大热天有一杯水可真解渴啊！也不懂得西餐的菜是一道一道上的，以为等上齐菜再吃，结果浪费人家不少的时间，直到服务生确认这帮土包子是真不懂规矩时，才敢主动为他们解围。这次是余锐回地方后第一次出差来上海，想一想这些往事都会暗自发笑。

这时的上海，虽然城市建设也是年年欠账，显得陈旧些，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市容市貌仍是风韵犹存，要参观游览的话，转上几天是不成问题的。但这次是有言在先，还是以考察学习为重，因为这次安排了九个项目需要去学习访问，所以大家不敢怠慢，马上就开始了工作。从上海王振信总工、潘钧所长及各部门负责同志的介绍中得知，上海地铁早在1958年就开始搞规划，他们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先修建三条放射线、一条环线、一条半径线，共103公里、81座车站。文革前曾在衡山路搞了六百米试验段，目前搞的几期试验工程也是逐步发展的，但很困难，因为没有全局的布置，具体设计是很难进行的，建委、科委准备花两年时间搞地铁可行性研究报告，想较好地解决全局方面的问题。文革以后经济很困难，地铁上马是不现实的，但他们的思路和广州是有区别的：广州是地铁不能大上就大下，上海是地铁不能大上就不停顿地、认真地抓试验段，从实际施工的角度，研究关键的施工技术。上海地质条件是很差的，是软土沉积层，以黏土、

粉细砂为主，含水量和灵敏度都很高，政府每年都拨出足够的经费，把很适合上海施工的盾构法和连续墙法，在实战环境的试验段中施工，深入试验研究，在地质、设计、工艺、沉降、防水等方面，取得宝贵的科学数据。当然也是有风险的，因为施工技术发展很快，现在试验的工法，不一定是将来采用的工法。比如这次他们考察的压气盾构开挖技术，在当时是先进的。当上海的杨工程师带领余锐、邵章、李珍进入气闸时，还有上海海军医学研究所的三位同志同行。由于加了0.4个大气压以后，工作面就没有地下渗水，而且地层能稳定自立。这个加减压的过程必须在人们生理条件能够承受的时间内进行，在当时试验是成功的，但这种加气压的工法，对人的安全始终是有威胁的，所以推动了后来泥水盾构和土压平衡盾构的发展，以至展开施工时完全取代了这种工法。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有连续性的，只要是科学的试验是没有绝对失败的，它使上海的盾构技术在国内达到领先水平，在国际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上海地铁发展的思路是符合人们认识规律的，肯定不会发生有些广州作家笔下所描述的：“……众多权威的工程专家们纷纷发出了一个冰冷的预言，要想在广州这种地下水丰富、世界地质博物馆式的岩层中修建地铁，这计划，简直就无异于一个天方夜谭的情况。”早期曾经参与广州地铁咨询的权威工程专家，他们有麦蕴瑜（科协主席）、罗明橘（华工院长）、金泽光（建设局总工）、卓观培（铁路局总工）、北京的付清谈（北京基建工程兵总工），以及上海的孙钧、侯学渊（岩土力学专家）、王振信（上海地铁总工）等，从未听他们说过这样的预言，如果假定他们会说出这样的话，本身就是天方夜谭。

上海的同志很坦诚地告诉广州的考察组，在地铁总体方面不要学他们，同时他们也开始加强这方面的工作。首先在修建地铁目的方面，已经决定采用以解决城市交通为主的方针，所以客流预测开始由公交公司牵头进行，那时上海有4000多辆公共汽车，每天有1000万人次乘客，高峰客流占11%~12%。据公交公司吴副总工程师介绍，市里已经下达了客流预测的任务，所以正在进行出行调查。他们是在月票调查的基础上搞的，也是一种尝试。杨总告诉广州考察组，重力模型用月票调查不行，建立数学模型